中华美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

□金 雅

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和诗意向度，历经千年的发展，有丰富的表述，相关概念、范畴、命题、内涵、旨趣等，也有具体的演化。但“趣”和“境”，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感向度，则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高趣至境，是中华艺术和人格代代传承的风范和标杆，在今天，也应与新时代的精神风尚相联系，着力充实发展其内涵，积极发挥其精神层面的导引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的文化与学术，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时代，既要不忘初心，又要变革创新；既要珍视自身优秀的传统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能妄自菲薄，也需要直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开拓前行，实现民族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彰显新时代精神的中华美学风范，引领当代艺术发展与生活实践，引领社会风尚与文化思潮，推动中西美学的互鉴和中西文化的对话。

一

中国古代没有“美学”的理论概念和自觉的学科体系，但中华文化有着泛审美泛艺术的特点，形成了尚美立美弘美的深厚传统，在世界文化与美学之林中独具特色。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一度对西方美学资源过度崇信与依赖，简单搬用西方美学的原理、学说、方法、立场等，使得唯西方美学是瞻的状貌和民族美学虚无的心态滋长蔓衍，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优长。西方经典美学以思辨性、逻辑性、理论性见长，注重认识的、实证的等科学客观的方法。中华传统美学则关注情感、诗性、价值等要素，注重体验、感悟、践行等主客合一的方法。西方经典美学以康德哲学的知情意三分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它更关注的是美真的关联，关注外在的美的真理性。中华传统美学，是在泛审美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上的生成，有着浓郁的伦理情结，更关注美善的关联，关注美对人的意义。20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东渐，引入了真这个新维度。20世纪上半叶，中华美学发展进入第一个自觉的理论建设期和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峰期，涌现出一批迄今都堪称代表的美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不仅引领了民族美学的现代风范，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文化、社会影响。这些大家广纳中西，融汇古今，关注现实，关怀民生，普遍主张真善美的三维关联，主张美对于人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主张超越纯艺术论的大美观。由此，初步奠定了中华美学的基本精神风范，包括以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观、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观、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美境观等为代表的民族化美趣。中华美学的这种民族风范，具有突出的人文情怀、诗性情韵、现实精神、美育向度，体现了知情意行相统一的人生论美学品格，成为民族美学最具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以西观中、以西论中、以西证中的立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的美学资源、历史传统、优秀精神，缺乏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的提炼，中国古典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之间也缺乏有效的贯通与对话，或泥于以西学之法介绍西方美学，或简单以西学之法剪裁中国古典美学，其结果都导致对我们民族自己的美学精神和美学风范视而不见。

中华美学风范，是中华美学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呈现，代有绵延传承，时有创化发展。今天，推动中华美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的深度交融，更好地发扬、丰富、提升、光大民族美学的时代风范，切实介入、指导、引领当代美学、美育、人生实践的发展，是民族美学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和实际问题，也是中华美学大有用武的价值所在。

二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弘扬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风范，加强美学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导向。

中华哲学以人生关怀为内核，富有浓郁的人生情韵，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范。中华美学不尚以美论美的纯理论思辨，不以对美的问题的纯理论探究和美学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为最高目标，而是主张将美的理论贯穿于实践，强调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与人的生命、生活、生存实践的合一，凸显了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突出的生存关怀。中华美学的视野是开阔的开放的。它直面广阔多彩的人生天地，涵融了人与自然、艺术、社会、自我之间创美审美的多维实践，在宇宙俯仰、时空纵横、物我交融、生命驰骋、艺术涵咏中绵展与深味。中华美学的概念命题往往不着美而言美，追求超越小艺术和纯（唯）美之阈限，崇尚审美品鉴、艺术品鉴、人生品鉴融汇的大美气象。“大艺术”“大词人”“大艺术家”“人生（生活）的艺术化”等概念命题，都是这种美学风范的体现，非常富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同时这些概念也有着深厚而普遍的人文底蕴，有着穿越时空的鲜活强劲的生命力。

大美的风范，倡扬的是创美审美的实践主体不泥于自我小我之忧乐，不限于技巧形式之雕琢，逸出个人的小世界和艺术的小天地，关注现实，关怀民生，关爱天地万物，关切人类宇宙。人民情怀，民生关怀，都是新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新发展。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基本人文素养的提升，精神世界的丰富，与自然的和谐，艺术化生活的普及等。中华美学的大美风范，在创美审美的视野、立场、方法、趣味、取向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引领意义。我们应该不断充实其新时代的新内涵，发挥其提升当代生活、人文精神、人格修养的独特价值。

三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光大真善美贯通的美情风范，突出美学的情怀担当。

真善美相贯通，是中华美学与西方经典美学相区别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之一。以康德为代表的知情意三分的经典理论美学范型，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石，整整影响了中国美学近百年的主流形态。言即称康德，论即及无利害性，这在中国现当代美学界实非鲜见。由此，不仅导致了对民族美学的诸说、诸家、诸派所谓“功利主义”或“非功利主义”的简单划分与比附，也导致对民族美学的优秀精神视而不见，自卑虚无。事实上，中华美学在美论问题上，是很有见地和特点的，由此也形成了对真善美关系思考、论析、表达的独特风范。其中，非常突出而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主张真善美贯通的美情品格。美情的思想，在中华文化和美学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艺术和美学，与西方艺术和美学相比较，在重情与重理上，自古就是以情为尚的，情的分量明显偏重。所以，中国传统诗学自古就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讲情是要以礼为规范的，所谓节情导欲。因此，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中，也讲情理交融，这个理与西方式的科学理性之理不同，有着浓郁的伦理内涵。中国古典美学有个特别有名的命题，就是孔子讲的美善相济。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是以善为美的内核和前置条件的。中国现代美学从西方美学吸纳了真的命题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王国维第一个从现代学理意义上运用“美情”的概念，但主要是在康德的理性论的立场上。此后，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丰子恺等，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美情”这个词，但他们关于情趣（趣味）建构和情感（趣味）教育的命题，是对中华美情思想的重要推进。

美情的意趣是中华美学独特而重要的精神风范，在理论上予以提炼建设，在实践中予以光大运用，在今天具有突出的意义。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风范，其核心的理论基石乃是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论。美情是与康德意义上的无利害的粹情（美）相区别的。后者的理论前提是思辨意义上的知情意三维的独立，由此也使得西方经典美学更多的是一种书斋中的美学，哲学的美学，思辨的美学，静观（心理）的美学。而中华美学的美情风范使其具有内在的实践意趣，知情意相贯通，以情蕴真涵善，践之于行，从而走向人自身的美化，走向生活的美化，走向实践的美学，美育的美学，人生论的美学。在艺术的层面，美情也与很多具体问题相关联，因为情始终是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当然，美情的理论与精神，其具体的展开，从当下来说，还很需要理论上的拓展、深化，也很需要在实践中的运用、自觉。对原生的日常情感予以加工、改造、提升、完善、传达、表现，养情、涵情、正情、炼情、提情、导情，都是创美审美实践中的美情之义，也是美情的具体指向。这对于提高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品格，提升人自身的情怀，直面当下种种所谓消解本质、悬搁价值的思潮冲击，建设新时代屹立于世界东方、彰显中国智慧的文化精神与社会风尚，均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四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拓展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诗性风范，体现民族美学追求高趣至境的张力向度。

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诗性传统。它既不从纯粹思辨去寻求人生真理，也不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而是深深扎根于丰厚的生活土壤，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情趣境界。中华文化倡扬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有无相生、出入自由，崇尚道法自然、生而不有、身与物游、自在自得，从而构筑了既鲜活生动又高逸超拔的生命气象，内蕴着温暖的人生情怀和深邃的诗意情韵。这种深蕴内在张力的人间诗情，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范，突出呈现为以高趣至境为重要象征的诗性美观，凸显了对物我有无出入关系的叩问与追求。中华美学的诗性美观，既非功利亦非出世，既不因超拔功利而否弃人间情味，也不因关怀生存而庸俗媚俗。它以创造与欣赏、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有为与无为、有限与无限的诗性张力之构筑，确立了审美主体与实践主体合一的诗性命题，超越了用和非用的直接对峙，将以无为精神体味有为生活的诗性价值追求，化衍为生命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由此，不仅将创美审美的实践引向广阔的人生、绚烂的生命、多姿的生活，也将美的趣味和境界确立为人生超拔、生命升华、生活提升之引领，形成了高趣至境的价值向度。

“趣”和“境”，是中华美学诗性风范的两个重要呈现维度。中国古典文论中，就有“趣”和“境”的运用。前者主要指艺术鉴赏时的主体美感取向，更多与作品的美感风格和主体的情趣指向相关联。后者主要指艺术形象的主客交融及其呈现的主体精神气象。两者都不是简单地从形式或技巧品鉴艺术之美，也不是把艺术中的诸元素分割开来作孤立的赏鉴，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观，将作品与作者、客体与主体融为一体。由此，“趣”和“境”在中华传统美学中，也逸出了艺术的小天地，指向了涵育作者和作品的广阔生活，把作者和作品背后的人生，纳入了自己的视域，成为勾连美、艺术、生活的独特的民族美学范畴。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大家，如梁启超、朱光潜等，都尚“趣”，把“趣”和“味”“情”相联系，特别是与“情”的联系，有力推动了“趣”范畴的理论提升。王国维、宗白华等，则尚“境”，把“境”与“意”“界”相联系，特别是与“界”的联系，也推动了“境”范畴的理论提升。“情趣”和“境界”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两大核心范畴，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对高趣至境的精神风范的诗意追求，一种超逸的人格风韵和超拔的生命姿态。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和诗意向度，历经千年的发展，有丰富的表述，相关概念、范畴、命题、内涵、旨趣等，也有具体的演化。但“趣”和“境”，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感向度，则一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高趣至境，是中华艺术和人格代代传承的风范和标杆，在今天，也应与新时代的精神风尚相联系，着力充实发展其内涵，积极发挥其精神层面的导引意义。

农村题材创作要直面乡村振兴

□刘金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今年两会的重点话题，发展乡村文化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内容。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根基和厚重母体，乡村人事物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素材。关注民瘼、赞美田园、书写农事，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士子的基本生命体验和重要审美取向，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乡土文学，也成为中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维度，涌现出众多文质俱佳、流布后世的经典作品，对构建乡村文化和发展乡村文明起到了浸润濡染的基础性作用和培植涵育的功效。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农村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一方面是老中青三代作家各领风骚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是长篇中篇短篇多种形式齐头并进的创作态势日趋强劲，涌现出包括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付秀莹的《陌上》、李佩甫的《平原客》、刘庆邦的《牛》、贺享雍的《乡村志》、沈洋的《万物生》等一批优秀长篇小说，表明一些实力派作家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农村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上。与长篇小说将创作触角用于状绘农村现实生活图景相一致，近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更多地摹写当下农村物质领域与精神界域发生的深刻变迁，莫言的《天下太平》、朱辉的《七层宝塔》、葛水平的《小包袱》、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刘庆邦的《英哥四幕》、夏鲁平的《吃喜儿》、曹多勇的《盖楼记》、陈集益的《驯牛记》等作品，都是当下农村生活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影，均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这说明当代作家们正在致力于重建乡土文学连接乡村生活的人文桥梁，力求获得一种新的时代观念的引领和精神意识的支持。

尽管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佳绩，但与发展乡村文化、满足新时代农民精神需求的时代要求相比，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品质上，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是当前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没有与乡村振兴实践及时跟进。一些作家缺少适时尚变的内在动能和自我张力，未能根据时代大势来捕捉乡村振兴的生动场景；个别作家缺少积极推崇新时代乡村精神价值的自觉意识，对乡村民众的意愿与呼声缺乏密切关注和热切回应，对乡村文化发展的深层意蕴开掘得不够系统、言说得不够深透，仅仅满足于欣赏和捡拾乡村生活的鸡零狗碎和一地鸡毛，因此，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局促黯淡，缺乏全面决胜小康的宏阔背景和时代气息，一些乡村干部和村民形象被概念化和模式化，部分作品一味迎合庸俗趣味、市场逻辑和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乡村的臆想，蓄意渲染苦难、落后等负面因素；还有些作者沉湎于纯粹的“小我”天地，由个性化遁入“个人化”，由“个人化”遁入“私人化”，玩耍技巧，迷恋叙事，令作品逐步远离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逐渐闭隘萎缩并走向广大读者的反面。二是农村题材小说在表达方式上过于通俗而在审美内涵上明显孱弱。农村题材小说作为农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文化产品，应从农民群众的文化接受能力出发，力求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需要作家创作时接地气，注重叙事的大众化和娱乐性，使作品更加雅俗共赏。但是，文学作品毕竟还具有提升大众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功能，因此农村题材小说只有趣味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葆有高迈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高超的美学品位。揆诸文学发展现状。不难发现一些农村题材小说作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功能，放弃了深层的精神愉悦和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卡塔希斯”效果，淡忘了传统乡土小说的意境悠远和耐人寻味，而是关注感官反应和阅读便捷。三是嫁接西方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无视农民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创作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农村题材小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因此，坚持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成为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但从当今创作现状来看，开放姿态与借鉴风范体现得过于浓烈而张扬，一些作品几乎全然抛弃了民族元素、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生搬硬套西方后现代派艺术表现形式，很难为农民群众所接受与认同。

基于中国当代国情和未来发展做出的全局性考量和战略性决策，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步骤。当前，理论界和文化界对于乡村文化发展主要从文化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角度来思考和探讨，而很少从文学、美学等精神文化层面来研究其路径。事实上，乡村文化发展既需要综合运用器物、人才、制度等多种手段，又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濡染和引领作用。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维度，应置身乡村振兴的潮头，审视、提炼和升华乡村振兴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和文化关怀，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佳构妙作，满足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切实体现出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真正价值。一是要传承乡土文学优良传统，创作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佳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成为现代作家的自觉追求，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构成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阿Q正传》《祝福》《春蚕》，还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抑或《陈奂生进城》《乡场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凡的世界》，这些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体现了文学关注农村变迁、反映农村变革的特殊作用。党和政府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关心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期待，要求广大作家更加悉心地描摹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热情地讴歌新农村的历史变迁和新人物的思想境界，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二是要坚守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描绘乡村振兴的绚丽画卷。在广阔新异的农村天地里，呈现的已不仅仅是田垄沟渠、麦海稻浪，还有高楼大厦、现代工厂，奔波忙碌的身影也不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父老兄弟，还有来自境外的投资商、城市的企业家、高校的大学生和机关的扶贫队。特别是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涵育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在农村早已落地生根，新时代的勤劳致富者、奔小康带头人、村民自治组织负责人等新农民形象层出不穷，这与传统乡土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迥然有别。进入新时代的农村面临着新形势新变化，这就要求广大作家要深度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本质，及时反映新时代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精心创作具有新时代中国农村特色、气派、风格并为读者青睐的优秀作品，努力为乡村振兴奉献出精彩篇章。三是要秉持抑浊扬清的人文理念，坚守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学纪念碑，文学作品是特定时代的形象表达。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交错叠加的时代语境下，乡村绝非记忆中的乡村，农民绝非被启蒙被唤醒的农民，农业也绝非单纯满足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变动不居的“三农”现实为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当代作家要立足于“三农”现实的文学诉求，站在农民群众立场上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乡村、农民和土地作为小说书写、想象和状摹的重心。